

蒙古族自元朝覆灭后分化为复杂的部落体系：漠南蒙古在清初已归附清廷，形成内札萨克四十九旗；漠北喀尔喀蒙古则分为内喀尔喀五部与外喀尔喀七部。天山南北的厄鲁特蒙古（元代称“卫拉特”）则分为准噶尔、和硕特、杜尔伯特、土尔扈特四部，其中准噶尔部在康熙十年由噶尔丹继位后，逐渐成为北疆主要不稳定因素。噶尔丹趁清廷平定“三藩之乱”之机，勾结沙俄发动对北部蒙古诸部的兼并战争。1690年，乌兰布通之战后为清廷经营蒙古创造了条件，康熙皇帝在此将喀尔喀蒙古按内蒙四十九旗规制编设，设爵定品，并敕建汇宗寺，确立“以教固边”的治理模式。

据《热河园庭现行则例》记载，避暑山庄周边12座皇家寺庙的管理体系呈现显著差异：溥仁寺、溥善寺、普宁寺、普佑寺、安远庙、普陀宗乘之庙、须弥福寿之庙、广缘寺、殊像寺共9座，因驻有藏传佛教喇嘛并由理藩院按人数按月发放钱粮，且在京城设有“下处”（办事机构），故统称外八庙（其中普佑寺附属于普宁寺，合为一处管理）；而罗汉堂、广安寺、普乐寺3座寺庙不驻喇嘛，由内务府直接管理，不纳入外八庙体系。这种管理分野本质上反映了清廷对寺庙宗教功能的政治定位：驻喇嘛的寺庙承担边疆民族宗教凝聚功能，而内务府管辖的寺庙更多服务于皇家生活需求。

一、汉藏佛教文化交融的建筑实践

（一）汉式寺庙的文化锚定：溥仁寺与溥善寺（1713年）

作为外八庙中最早营建的寺庙，溥仁寺与溥善寺的建造直接呼应康熙皇帝六十大寿时蒙古诸部“建寺祈福”的请求。溥仁寺采用典型的汉式伽蓝七堂式布局，中轴线上依次为山门、天王殿、大雄宝殿、后殿，配殿对称分布，飞檐斗拱与歇山屋顶体现中原建筑的典雅庄重。其碑铭明确记载“蒙古部落，三皇未曾治理，

五帝未能使服，今中外一体无异”，将建筑作为政治宣示的物质载体。

大雄宝殿内的三世佛造像尤为典型：如来佛结跏趺坐于莲台，衣纹线条流畅自然，采用汉传佛教造像的写实技法，面部表情温和肃穆，体现儒家“中庸”审美与佛教慈悲精神的融合。殿内梁柱彩绘以汉地传统的龙凤、祥云为主题，与藏传佛教常见的莲瓣、梵文装饰形成鲜明对比，这种纯粹的汉式风格设计，旨在通过文化认同拉近蒙古诸部与清廷的心理距离，实现“施仁政于远荒”的治理目标。

（二）汉藏融合的开创性实践：普宁寺（1755年）

普宁寺的营建与乾隆初年平定准噶尔达瓦齐部直接相关，其建筑规制仿西藏桑耶寺，开了承德汉藏结合式寺庙的先河。寺庙布局分为前后两部分：前半部为汉式建筑群，自山门起沿中轴线依次为天王殿、钟楼、鼓楼、大雄宝殿，建筑形制采用歇山顶、斗拱等汉式元素；后半部为藏式建筑群，以大乘之阁为中心，四周环绕象征四大部洲的碉楼式建筑，屋顶覆盖鎏金铜瓦，墙体刷涂红色，体现藏式建筑的雄浑风格。

大乘之阁内的千手千眼观音像是汉藏艺术融合的典范。殿内壁画更为独特——东墙绘汉地十八罗汉，神态各异，采用工笔重彩技法；西墙绘藏式妙音天女，身姿灵动，融入藏传佛教的“波罗风格”，两种艺术体系在同一空间和谐共存，实现了宗教艺术的跨文化表达。

（三）边疆民族记忆的空间重构：安远庙（1764年）

乾隆二十九年（1764年），为安置从新疆东归的达什达瓦部，清廷仿伊犁固尔扎庙形制营建安远庙，旨在通过建筑复刻慰藉部众的思乡之情。寺庙主体建筑普渡殿采用藏式平顶与汉式柱网结合的独特结构——外观为三层藏式碉楼，内部却采用汉式抬梁式木构架，这种“外藏内汉”的设计既保留了伊犁寺庙的视觉特征，又适应北方建筑的结构需求。

承德清代宫廷汉藏佛教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与建筑阐释

——以避暑山庄外八庙为中心

■ 李东

殿内主供绿度母像，严格遵循藏传佛教造像量度经，头戴五佛冠，身佩璎珞，体现藏传造像的庄严法度；而四周壁画则融入厄鲁特蒙古的文化元素——描绘草原游牧生活场景时，人物服饰、帐篷形制均参照达什达瓦部传统，甚至出现汉地少见的“套马图”“驯鹰图”。这种文化混搭的设计策略，使安远庙成为民族迁徙与文化包容的物质见证，既强化了达什达瓦部对清王朝的政治认同，又保留了其独特的文化记忆。

二、宗教仪式与政治认同的互动机制

（一）多元宗教活动的制度化设计

外八庙的宗教活动被纳入清廷的政治礼仪体系，形成固定制度。每年正月十五，普宁寺举行“跳布踏”，蒙藏喇嘛身着法衣，佩戴护法神面具，按藏传仪轨诵经起舞，乾隆皇帝曾亲撰《跳布踏说》记载该仪式“以时演试，用禳除不祥，盖亦古者雩之意也”，将藏传仪式与汉地雩戏类比，赋予其文化合法性。“木兰秋狝”前的宗教集会更具政治意义——蒙古王公齐聚汇宗寺（多伦）与外八庙，参与诵经、朝觐等活动，康熙、乾隆皇帝常在此主持“诸部长会同述职”仪式，将宗教活动与边疆治理直接结合。

（二）帝王宗教身份的双重建构

乾隆皇帝在殊像寺（1774年）的营建中，将个人宗教认同与国家政治需求深度结合。据《殊像寺碑记》记载，乾隆皇帝陪同皇太后朝拜五台山殊像寺时，因“见文殊像，默识之于心”，自认为文殊菩萨转世，遂在承德仿建殊像寺。寺庙采用汉式园林布局，引入假山叠石，模仿五台山“清凉胜境”的地貌特征，而主尊文殊像却头戴藏传佛教五佛冠，身披藏式袈裟，形成“汉地山水+藏传造像”的独特格局。

这种身份建构具有双重政治意义：对蒙藏民族而言，帝王以“文殊转世”形象出现，强化了“佛教转轮王”的精神统摄力，符合藏传佛教“政教合一”的传统认知；对汉地官僚集团而言，寺庙的汉式园林与儒家审美契合，避免了宗教认同对中原统治基础的冲击。殊像寺因此成为清代帝王“一身兼多重宗教身份”的物质象征，实现了对多元民族的精神整合。

三、文化交融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

（一）边疆治理的“文化整合模式”

外八庙的营建开创了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创新范式——通过文化元素的选择性融合实现政治整合。以普陀宗乘之庙为例，其主体仿西藏布达拉宫，却在大红台顶部增设汉式琉璃瓦鎏金宝塔，在藏式白台墙体嵌入汉式券洞；造像艺术中，吉祥天母像的坐骑为汉地传统的狮子，而非藏传常见的骡子，这种“藏式主体+汉式细节”的设计，既尊重了藏族的文化主体性，又通过汉式元素强化了中央政权的文化渗透。

须弥福寿之庙的营建更具代表性，其名称“须弥福寿”取自藏语“扎什伦布”的意译（“扎什”意为“福寿”，“伦布”意为“须弥山”），建筑布局仿日喀则扎什伦布寺，却在琉璃牌坊、碑亭等细节采用汉式做法。六世班禅在此居住期间，既按藏传仪轨举行法会，也参与汉式的“写寿字”活动，这种文化互动使寺庙成为“多元一体”理念的物质载体，实现了“合内外之心，成巩固之业”的政治目标。

（二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滋养

外八庙的建筑实践揭示了一个重要历史逻辑：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不仅依赖军事与政治手段，更需要文化情感的联结。从溥仁寺的汉式典雅到普宁寺的汉藏合璧，再到普陀宗乘之庙的藏式宏阔，这些建筑以空间语言书写了各民族文化交融的历程——汉式斗拱与藏式碉楼共生，汉传佛像与藏传造像并存，中原审美与草原文化互鉴，共同构成清代“大一统”王朝的文化认同基础。外八庙所有的建筑实践证明：尊重各民族文化特性与维护国家统一并非对立，而是可以通过文化交融实现有机统一。深入发掘这些历史遗存所承载的民族交往、交流、交融史实，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深厚的历史滋养，进而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历史借鉴。

综上所述，承德外八庙以建筑为媒介，记录了清代汉藏佛教文化交融的壮阔历程。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，“外八庙”所展现的文化包容精神，对于理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逻辑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。■

作者单位：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（河北）